

四大古典名著校注本

施耐庵 罗贯中一著

水浒传

上

你是不好看。你是乾死，活时同话。你放故半夜，更来助我庄上。王四道：「你几时回来？」史进道：「史进上裤子问道：『你两个都不要何吉，你如何不告诉我？』」李忠道：「我本不知，林子里打得王四的回来，时间把官厅前看，因此事发。」史进叫王四问道：「你说不回书，如何却又有了？」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时醉了，忘记了回书。」



岳麓书社

SIDAGUDIANMINGZHUJIAOZHUBEN
SHUIHUQUANZHUAN
SHINAIANLUOGUANZHONGZHU
WUZHIDAJIAOZHU

四大古典名著校注本

【上】

水浒传全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吴志达\校注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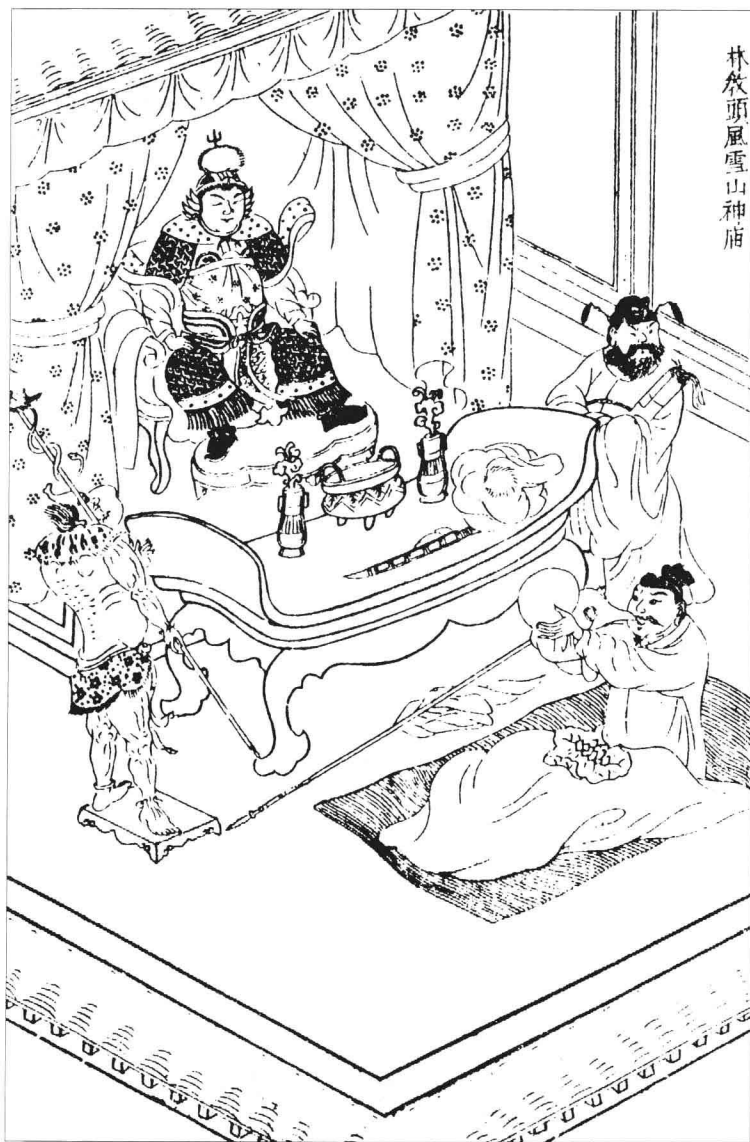
魯提轄拳打
鎮關西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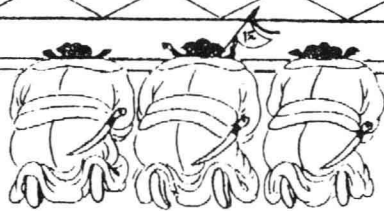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吳用智取生辰綱





梁山泊義
士尊見蓋

景陽岡武
松打虎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前言

—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世界性的古典名著。它的作者是谁？却众说纷纭。明人高儒《百川书志》所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似较切合实际。据说施、罗有师生关系，老师撰著，学生整理，亦是情理中事。关于施耐庵的生平，尚无可靠材料。江苏兴化县白驹场（现属大丰县）发现《兴化县续志》所载明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生于元代，卒于明初，在元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对墓志的真伪，还有争议；当地出土文物所称“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多数专家也持否定态度。至于罗贯中曾作张士诚幕僚，编《水浒传》以宋江受招安为结局，劝谏张士诚，聊备一说。

创作《水浒传》的时代背景，一般认为是在元末明初，但也有人根据书中的某些地名，或凌振的轰天雷母子砲，认为是明代中期的作品。《水浒传》从成书到传抄乃至多种版本的出现，经过多次润饰、改动、增删，与原著本来的面貌不尽相符，以至难以确断成书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像《水浒传》这样以描写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元明之际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出现，也许更切合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现实需要。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但也有某些史实作依据。有关史籍表明，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这支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很多，骨干成员才三十六人，但是战





斗力很强,非常活跃,驰骋在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到首都汴京附近活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所向披靡;后来在统治者的暴力镇压和诱骗之下,终于投降,并被利用去镇压方腊起义。与宋江同时代的人李若水文集中有《捕盗偶成》一诗,记述了宋江等受招安后封官的情况:“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有的材料则说擒方腊在前,俘宋江在后,宋江不曾参与镇压方腊。

当时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腐朽,政治黑暗,蔡京、童贯、高俅、朱勔、杨戩一伙狼狈为奸,逼害忠良,欺压百姓,祸害国家。因而人民群众对昏君奸臣非常痛恨,而对那些敢于反抗统治者,为民除害,劫富济贫,救困扶危的英雄豪杰,则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深表敬佩。宋江所领导的这支义军,大约是当时几支义军中最为群众所爱戴的。尽管他们后来失败、投降了,甚至去镇压别的起义军,但是人们仍然乐于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谈论宋江等人当年传奇性的英雄事迹;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又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想象,不断地丰富了英雄们的故事。

南宋时盛行“说话”(讲故事、说书),宋江等人的故事,已是“说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就是“说话”人的提纲,也是迄今能见到的《水浒传》最早的蓝本。但它所提供的,仅仅是片断的素材,既无完整的故事,更无个性鲜明的人物描写。留存至今的七种元杂剧“水戏”,故事情节为《水浒传》所吸收的,只有《梁山泊李逵负荆》。各剧中宋江已居山大王的地位,他的定场白中,均提及“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大概就是据此发展而来的。

二

《水浒传》的作者,敢于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水洼草寇”,作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来歌颂,把他们劫富济



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当作一面正义的旗帜——“替天行道”来招展;而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封建统治者,上至最高统治集团,下至州府的贪官污吏、地主恶霸,都视为祸国殃民之贼,痛加鞭挞杀伐,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残酷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还在于它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失败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和时代的面貌——“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规律,并从斗争艺术上提供了不少唯物辩证法的范例。它的悲剧性结局,客观上总结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让人们形象地看到了农民运动史上真正的大悲剧。由于作者世界观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及题材和主要人物本身存在的问题,《水浒传》在思想内容上也有其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宋徽宗的昏庸和荒淫无耻,既有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又维护其封建正统地位,宣扬了封建主义的忠义思想。作者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跳不出“奸臣当道,英明皇帝受了蒙蔽”的观念。书中虽有不少反皇帝的描写,但却反得很不彻底,重点是反权奸,反贪官污吏,最终还是维护皇帝权威。

二是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对宋江走投降朝廷的道路,抱同情态度,而对方腊起义,又作了歪曲的描写。并把方腊的反抗到底被擒受刖,与宋江投降为朝廷“建功立业”受封赠,形成对照,褒宋贬方。

三是在处理人物关系上,过分渲染封建主义的江湖义气。这种江湖义气,虽曾起过凝聚各地好汉上梁山的积极作用,但也起了以义气为重跟随宋江投降朝廷的麻醉作用。某些描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三

《水浒传》所描写的“乱自上作”、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主题思想和农民起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决定长篇结构的特色，即采取连环钩锁、百川归海的构架形式。在服从统一主题的前提下，各个主要英雄人物的斗争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林冲逼上梁山、晁盖等智取生辰纲、武松的故事、宋江从私放晁盖到流放江州、三打祝家庄等，都可以作为短篇或中篇单独存在，但是如果把这些故事从长篇结构中独立出来，就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来说，将大为减色，它就不可能是一部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而只是个别绿林好汉的传奇故事。所以，它实际上是有机的结构，各个环节是互相衔接、彼此呼应的，形成百川归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壮丽画卷，而其结局，则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令人扼腕沉思。它以描写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采取镇压和诱骗的两手政策为副线，从而展示出错综复杂、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全书除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故事的“引子”以外，其结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从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至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写农民起义的发生，也就是梁山泊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以前，为王伦阶段，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健全的组织。而高俅发迹史，是北宋末年朝政腐败的缩影，也是英雄志士被逼走上反抗道路的社会政治背景。王进的遭遇，在书中是作为与高俅等统治集团对立的一条引线出现的，由王进引出史进，然后一环套一环，一步一步地引出一连串英雄好汉造反的斗争故事。作者主要通过三件典型事例，表明英雄好汉燃起反抗怒火的必然性：一是鲁达由于救落难的金氏父女，打死恶霸“镇关西”，被逼出家做和尚；又因解救林冲，逼上二龙山。二是林冲被高俅一伙陷害，走投无



路,奔上梁山。三是晁盖等人因智取“生辰纲”,也被逼上梁山。而林冲“火并王伦”则为梁山根据地的发展扫清障碍。

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至宋江上山之前,为晁盖阶段(这时宋江是梁山事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中武松的故事是动人心魄的,而“大闹清风寨”、“江州劫法场”是两场革命风暴。“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全书的第一个高潮。

(二)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至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大发展时期。星散各处的英雄好汉如百川归海汇合梁山泊,形成奔腾澎湃的革命洪流。由一般山寨“打家劫舍”、“绿林剪径”的性质,发展成为一支“夺城政府”、“替天行道”的强大起义军。在梁山根据地内具备了初级农民政权的规模,肃清根据地附近的地主武装(如“三打祝家庄”、“夜打曾头市”),多次粉碎官军的“围剿”;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实施了“保境安民”、“不劫来往客人,不杀害人性命”、“救贫济老……百姓都快活”的政策。山寨上号令严明,赏功罚罪。因而天下英雄“同心归水泊”,远近人民歌颂宋公明。

第六十回“晁盖之死”和确立宋江为山寨之主,是起义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宋江更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梁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另一方面,起义军的领导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招安思想渐次滋长。“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意味着起义即将变质。“英雄排座次”是梁山起义的最高潮,也是全书的高峰。作者在“单道梁山泊好处”这篇言语中,充分表现了封建社会农民的乌托邦性质的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这是作者对农民起义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体现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



在“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高潮中，提出了发展前途和方向的新问题。以宋江为代表的招安思想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思想发生矛盾冲突。

(三)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至八十二回“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是招安的酝酿阶段。表面上看是梁山起义的鼎盛时期，“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实际上却是宋江利用义军的胜利作资本，为投降创造条件。

(四)第八十三至一百二十回，写农民起义的悲剧性结局。梁山义军在宋江等人的策划和封建统治者的欺骗下投降了，虽然有“征辽”的虚幻光圈，但主要是成为封建统治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的工具，使他们在互相残杀中两败俱伤，最后剩下几个人，也加以谋害。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却以“魂聚蓼儿洼”的悲惨结局而告终。悲剧结局是这部农民起义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总结了惨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农民革命战争没有正确的领导核心，走妥协投降之路，势必自取毁灭。

四

我不想把这篇《前言》写得太长，也无须面面俱到，例如某些人物形象、艺术特色，让读者自己去品评、鉴赏就是了。但是如何看待书中的核心人物宋江和招安问题，却是不能不谈的。

《水浒传》思想倾向上的一条主线，是“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李贽评点容与堂刻百回本《水浒传》而冠以“忠义”二字，可谓画龙点睛。“忠义”既对梁山起义军内部人际关系而言，又是对封建朝廷应尽的使命而言。英雄志士被奸佞权臣、贪官污吏所逼迫，上梁山造反，是忠义之举；劫富济贫，抑强扶弱，铲除贪官污吏，替天行道，是忠义之举；创造条件，接受朝廷招安，到边庭去一刀一枪，为国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乃至去镇压别的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在作者看来，也是忠义之举。这种思想倾向，在主要人物宋江的形象中，得到集中的表现。



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和讲史类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受招安的义军领袖形象的主要根据；但作家也很自然地会联想起自己所处时代某些类似的事件和人物。他反思历史，面对现实，经验与教训，对塑造宋江形象都有着深刻影响。作者既要描写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失败的全过程，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真实。既不能把他写成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改朝换代的封建帝王，也不能写成像方腊那样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英雄，而只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领导了农民起义却并不想夺取政权，封建主义忠君思想比较浓厚，因而以投降告终的悲剧性人物。

作者并不因为同情梁山事业，就把宋江描写为伟大的、气壮山河的起义领袖；也并不因为宋江是个投降变节分子，一开始就用丑化的、批判的笔调来描述他。《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具有复杂性格、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在宋江出场之前，作者先写了北宋末年危机四伏、官逼民反的形势，但宋王朝仍然能控制局面，农民还不可能通过造反的形式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这就是宋江所处的悲剧性的时代。他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和所受的文化教养，也带有某种悲剧性。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自己是个县衙小吏，“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又好习武艺，结交江湖好汉。这种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养成他比较复杂的思想性格。中产阶级家庭、封建伦理道德和文化教养，以及衙吏生活，与封建统治者及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养成安于现状、忠君孝亲、墨守法度的习性；同时，对封建吏治的丑恶本质、社会的病态、百姓的疾苦，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又使他具有一种正义感，每每为人们“排难解纷”，并且“仗义疏财”、“赍人之急，扶人之困”。衙吏应接上下左右，处理公文词讼的过程，养成谨慎严密、精明强干、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结识江湖好汉，社会接触面广，信息灵通，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培养起